

# 论范祖禹《帝学》与宋代的皇帝教育

申慧青<sup>1</sup>, 王瑞蕾<sup>2</sup>

(1.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2.保定学院 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君主专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皇帝在国家发展和政权稳固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力,对皇帝的教育也成为中国古代帝王学的重要内容。入宋之后,士大夫们在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观念引领下,对天子的为政之道和为君之德都有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突出影响了宋代的皇帝教育。北宋重要的史家和士大夫范祖禹在其所著《帝学》中,对宋代诸帝接受教育的形式、内涵及皇帝教育的意义都有所论述,是宋代士大夫关于皇帝教育的最为详细丰富的著作,展现出宋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见解。

**关键词:**宋代;范祖禹;《帝学》;皇帝教育;经筵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3-0064-05

宋代是中国古代君主集权主义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方面看,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削弱兵权、制约相权、限制州郡官员,大大强化了皇帝的权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宋代诸帝在限制武将权力,行使国家权力时,加强了与文臣士大夫的互动,《宋史·曹勋传》载:“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sup>①</sup>宋太祖亦曾亲口言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sup>②</sup>由此,宋代的士大夫普遍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同治天下”成为士大夫们的一种普遍理想<sup>③</sup>。

正是因为宋代诸帝的“文治”特征,皇帝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使得宋代的皇帝教育也具备突出的特点,这一时期,是“经筵”制度走向定型的时期。“经筵”是古代皇帝为习读经书而设置的御前讲席,据《后汉书·郅恽传》所载,“后令恽授皇太子《韩诗》,侍讲殿中”,可见,自汉代即有“侍讲”官员出现,为皇帝讲读《诗》、《书》等儒家经典,但“经筵”一词出现是北宋仁宗朝的事情了。担任经筵侍讲的士大夫们通过为皇帝讲习儒经,阐发了他们对于皇帝的个人修养、政治韬略、治国方针等问题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皇帝的决策,成为连接皇帝与士大夫的重要纽带。宋代史学家范祖禹自元丰八年(1086年)任宋哲宗侍讲,至绍圣三年(1095年)遭贬,任经筵侍讲官员几近十年,他所著《帝学》,辑录了中国古代帝王的学习经历,尤其重视对宋代仁宗朝经筵制度的记录,是研究宋代皇帝教育的重要范本。本文即通过对范祖禹《帝学》的研究,探索宋代皇帝教育的内容、模式和意义。文中不当之处,祈请各位学者予以指正。

## 一、范祖禹担任侍讲官员的经历

范祖禹(1041年—1098年)生于宋仁宗康定二年,其叔祖父为北宋名臣范镇。嘉祐八年(1063年),随范镇至

收稿日期:2012-01-23

作者简介:申慧青(1980-),女,河北保定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

①关于宋太祖誓碑的真伪之考,可参照张荫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文史杂志》第一卷第七期。

②程颐曾言:“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与范祖禹的观点如出一辙。见《河南程氏经说》卷二,《二程集》,第1034页。

京城汴梁,其后不久,范祖禹中进士甲科,时年23岁。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组织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作为编修人员之一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sup>[2]8309</sup>。元丰八年(1086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宣仁太后临朝称制,范祖禹将所著《唐鉴》呈进,为太后所赏识,擢任右正言<sup>[2]8606</sup>。八月,迁任著作郎兼哲宗侍讲<sup>[2]8609</sup>,自此开始了他“帝王师”的生活。

元祐三年(1088年),范祖禹上《劝学札子》于哲宗,称:“陛下今日之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则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sup>[3]10795</sup>提醒皇帝“正君心”的必要性,建议哲宗恢复讲读,重开经筵<sup>[2]10253</sup>。元祐四年(1089年)五月,吕公著去世,范祖禹官拜右谏议大夫,再次上疏太皇太后高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劳、万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开导上心,晓然存之于中,使异日众说不能惑,小人不能进”<sup>[3]10795-10796</sup>。七月,宋哲宗任右谏议大臣范祖禹为中书舍人兼侍讲<sup>[2]10381</sup>。十二月,进《道德爱身疏》于哲宗,进《上太皇太后乞保护皇帝圣体疏》,谏议哲宗勤政务学,治心明德<sup>[2]10309</sup>。元祐五年(1090年)正月,范祖禹又举荐韩维、苏颂、苏轼入经筵讲学<sup>[2]10527</sup>。同年八月,范祖禹上《帝学》于哲宗<sup>[2]10760</sup>,希望哲宗以前朝贤德之君为榜样,潜心向学,治心明道,终成明君。

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范祖禹继续上言哲宗,提出“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五事,希望哲宗遵循<sup>[2]11256</sup>。四月,举荐王存端、苏轼、赵彦若、郑雍、孔武仲、吕希哲、吕大临等入经筵讲学<sup>[2]11307</sup>。十二月,他又上《仁皇训典》六卷于哲宗,希望他能以宋仁宗为楷模,效法祖宗,勤勉修德<sup>[2]11401</sup>。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三日,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领国政,决意恢复新法,范祖禹虽上书力阻,然终未如愿。随着北宋党争的进一步激化,绍圣三年(1095年),范祖禹被贬武安军节度副使,元符元年(1098年)秋十月,卒于化州(原名辨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化州市),客死异乡。

范祖禹任职经筵几近十年,他的重要著作,无不与皇帝的为学之道、为政之要息息相关。他所著《帝学》一书,亦是研究宋代经筵教育的重要资料。

## 二、《帝学》所见宋代经筵制度

中国古代皇帝的学习模式,一是读书,二是由下臣讲读经书,这后一种活动,称为侍讲。侍讲古已有之,西汉陆贾为汉高祖说《诗》、《书》,唐初十八学士为唐太宗讲经史,均属此类活动。宋以前以大臣为侍讲,为皇帝讲解经义,但无经筵名。直至宋代,侍读、侍讲学士及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统称为经筵官,遂有经筵之称。《帝学》具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就在于它保存了宋朝的一项重要制度——经筵侍讲制度。

举行经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一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封建统治经验教训。范祖禹自元祐元年(1086年)受司马光举荐为宋哲宗侍讲,直至绍圣元年(1093年)受党争之累外放,任经筵官几近8年,对这项制度非常熟悉。《帝学》自第三卷至第八卷,叙述了北宋前六帝的经筵讲读过程,对讲读官员、内容都有详细的记述,对今人研究宋代经筵讲学制度,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帝学》共八卷,所载帝王32位,其中宋代6位皇帝,却占了六卷的分量,远超前代诸帝。从《帝学》的记载可见,北宋立国初期,宋太祖、宋太宗直至宋真宗均有诏臣子讲读经书的活动,如《帝学》卷三载:赵孚、昭素为宋太祖讲《周易》,吕文仲为宋太宗讲读经史,孙奭、李至为宋太宗讲《尚书》,邢昺、孙奭为宋真宗讲经义等。但所载条目较少,皇帝的学习活动依然以自己习读经书为主,侍讲未成定制,也未有“经筵”一说。宋仁宗开始,侍讲活动明显增多,《帝学》第四至六卷均为仁宗学习活动的记录,为全书篇幅最重,其中关于侍讲的记录占绝大多数。正史中“经筵”一词,正是在此时出现,《宋史》卷十二《仁宗本纪四》载:“(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丙午,以刘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命修起居注官侍经筵。”《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关于“经筵”的记录也始于宋仁宗朝,仁宗天圣二年(1026年),三月丁酉,“皇太后谕宰臣曰:‘比择儒臣侍上讲读,深有开益。’宰臣因言工部郎中马宗元通经有行义,可使人奉经筵”<sup>[2]253</sup>。这一点,与《帝学》中的记载也是大致吻合的。《帝学》卷四《仁宗皇帝上》记载了乾兴元年(1022年)十二月甲辰,仁宗“召辅臣崇政殿西庑观孙奭讲《论语》,既而帝琴书唐人诗以分赐”一事,并于其后说明“自是,每召辅臣至经筵,多以御书赐之”,可见,宋仁宗初年,经筵制度已经逐渐形成。

此外,《帝学》还记录了宋代经筵重要的讲官——崇政殿说书一职的出现。这是宋代经筵的重要侍讲官,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置,掌为皇帝讲说书史,解释经义,并备顾问。翰林学士之学术深厚者为侍讲、侍读,官阶

较低而资历较浅者则为说书。宋以后废。《帝学》卷四所载：“景佑元年正月丁亥，尚书都官员外郎贾昌朝、尚书屯田员外郎赵希言、太常博士崇文院检讨王宗道、国子博士杨安国，并为崇政殿说书，日以二人入侍讲说，崇政殿置说书自此始。”范祖禹就曾多次推荐官员至崇政殿说书一职。

### 三、《帝学》以“治心”为核心的思想内容

在封建专制条件之下，国家的稳定往往系于天子一人，他的决策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范祖禹在他所著《唐鉴》中指出，皇帝“杀谏臣，惑女宠，极奢侈，求长生，悦襍祥”等错误的举止最终导致国家动乱，主要是由于“有所陷溺其心”<sup>[4124]</sup>，因此，“治心”对皇帝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内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sup>[4169]</sup>。而《帝学》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希望皇帝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达到“治心”的目的。

范祖禹曾引《礼记·乐记》中的一段话上呈宋哲宗：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

并于其后评论说：

古之君子传先王之法言，论礼乐之本而造于道德之精微，孔子之门人祖述而传之，亦犹大学诚意正心齐家治国之说也。此学者所当尽心而人君所宜留意，臣是以敢献之。<sup>[9]315</sup>

由上文可见，范祖禹是将“治心”看作皇帝安邦立国的根本，他对道德心性的重视，远在北宋诸臣之上<sup>①</sup>。

“治心”如此之重要，而想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通过后天的学习。范祖禹对“帝王之学”非常重视，元祐四年，范祖禹曾上《进德爱身书》，劝诫哲宗努力求学，修心明德，元祐七年二月，向哲宗进言，劝其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又进《仁皇政典》，劝诫哲宗效法仁宗，“致诚好学”。不仅如此，他还在《帝学》一书中，反复强调这一道理。《帝学》所记载的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至宋朝前五帝的学习过程，亦是范祖禹关于皇帝修养心性的集中论述。《帝学》卷一，在记载舜为学的经历之后，范祖禹将他对于帝王之学的观点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

帝王之学，谓之大学。《礼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故学者所以“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明德于天下”，尧舜之道是也。<sup>[6]36</sup>

范祖禹引《礼记·大学》借以阐述皇帝为学之道，《大学》本为《礼记》中的一篇，自唐代韩愈、李翱等把《大学》、《中庸》看作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逐渐被士人所重视。范祖禹看重《大学》，是看重它将“正心”与“治国平天下”内外贯通的道理。范祖禹还曾进“汉昭帝选贤良”这一故事于宋哲宗，并在其后阐述了古代帝王学习的目的与方法，尤其提出了“师”的重要性：

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辅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及太子少长，则入于学，学礼……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鸾和，步中采荠，趋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明堂位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慎，天子疑则问，问则应，而不穷者谓之道。<sup>[5]310</sup>

在随后的论述里，范祖禹更加细致入微地阐述了天子之师的不同权力和职责。国君提高个人修养，主要依靠于

①“治心”本是佛家的经典说法，北宋僧人契嵩曾言：“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契嵩：《禅津文集·参寥子诗集》卷八《寂子解》），将佛教修身养性的功夫与儒学治国安邦的志向联系到了一起，这一点，对北宋的儒家士大夫有很强的吸引力。程颢就非常重视修心的重要意义，他曾言：“圣人，仁之至也，独能体是心而已，曷尝支离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贡求仁之方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四）。而司马光第一个将“治心”作为对皇帝的基本要求，并将其提升到了关乎国家安危的高度，在呈于宋哲宗的《修心治国之要札子》，他提出“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人君之心：仁、明、武，所出于内者也，用人、赏功、罚罪，所施于外者也”（《司马光奏议》卷三十一《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将人君的道德修养提高到了关乎国家安危的程度。

“端士”的言传身教,“师”在皇帝求学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范祖禹在《帝学》中,曾详述北宋时期的经筵侍讲活动,对尊师重道的作风,予以了极高的赞赏。如第四卷“仁宗”部分,范祖禹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帝每为御经筵,以象架度书策外向,以使侍臣讲读。天圣末,孙奭年高视昏,或阴晦,则为徙御座于阁外。奭每讲论至前世乱君亡国,必反复规讽,帝意或不在书,奭则拱默以俟,帝为竦然改听。当书无逸图之上,帝施于讲读阁。<sup>[617]</sup>

孙奭担任宋仁宗经筵侍讲时已年将70,仁宗其时还是未满10岁的孩子,孙奭讲读不敷衍不谄媚,而仁宗学习态度积极,对老师也尊重有加,这种师生间的和谐互动,深得范祖禹欣赏。

《帝学》全书八卷,而仁宗一人的事迹就有三卷,这不仅是由于仁宗对帝师的敬重,更重要的是范祖禹对仁宗“终身以学”的态度十分赏识,这也是他做宋哲宗经筵侍讲期间,对哲宗劝学的重要例证。《帝学》“仁宗下”的最末,他就曾对哲宗言道: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以尧舜为师法,待儒臣以宾友,迹英讲学,游心圣道,终身未尝少倦。是以一言一动,仁及四海,如天运于上而万物各遂其生于下,其本由于学故也……臣愿陛下欲法尧舜惟法仁宗而已,法仁宗则可以至天德矣。<sup>[617]</sup>

元祐五年范祖禹任宋哲宗侍讲时进《帝学》于哲宗,其时宋哲宗赵煦也不过才13岁,范祖禹将他对家国天下的期望,都寄托于这个少年皇帝之上,他一心劝学,也正是希望哲宗能“宪道于三皇,稽德于五帝,轨仪于三代,法象于祖宗,集群圣之所行,体乾健之不息,则四海格于泰和,万年其有永观矣”<sup>[618]</sup>。

#### 四、《帝学》的影响

虽然《帝学》具有明显的劝学目的,但作为范祖禹的学生,宋哲宗本人对此书并无特别重视。尤其是自元祐八年之后,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范祖禹作为反变法派的重要成员,逐渐被排挤出了政权核心,他的著述与其政治思想一起被宋哲宗所摒弃。同时,相比于范祖禹的另一本史著《唐鉴》,《帝学》在北宋的影响要小得多,这可能与其未及刊印,流传范围较小有关,按《帝学》书前序所言,则《帝学》的首次刊刻当在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年),比《唐鉴》晚了近130载,“藏弃御府有年”阻碍了它的流传。然而,从长远看,《帝学》的影响似较《唐鉴》为大。如上文所讲,南宋之后的学者对《唐鉴》的关注,多集中于“中宗在房陵”之类记载,重视《唐鉴》所蕴含的褒贬之义超过了它的史学价值。《帝学》则不同,从读书分类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中,都将其归于“子部·儒家类”之下,但《帝学》在《宋史·艺文志》的“史部·史钞类”亦可见,这也体现了《帝学》内容的复杂性:《帝学》所载上至伏羲、下迄宋神宗,但所记内容单一,均是关于帝王“求学”以“治心”的过程,并且多记宋朝仁、神两帝的向学经历,因此,不仅儒生学者对它颇为重视,居庙堂之高的天子也对它赏识有加,还出现了不少模拟它的著作。《帝学》因其直面皇帝“心性”的培养,成为后人所看重的皇帝“教科书”。

较早对《帝学》提起重视的人应属南宋人吕中,在其所著《宋大事记讲义》中,吕中提出:“惟本朝以家学为家法,故子孙之守家法自家学始。此范祖禹《帝学》一书极言我朝承平百三十年,异于汉高祖,由祖宗无不好学也。”<sup>[7]卷六</sup>这条议论充满了宋人的特色,并且把握住了《帝学》的思想核心。如第二章所述,范祖禹对“祖宗家法”极端重视,这不仅体现于《唐鉴》之中,《帝学》的若干篇目也包含了这一内容。《帝学》列举前代诸帝为学之故事,宋以前仅占三分之一,重心都在于“本朝家学”。吕中所生活的年代是南宋晚期的宋理宗朝,“君子、小人”之辩流行朝堂,皇帝的心性修养重新成为朝臣所关注的焦点,吕中于此时重提范祖禹《帝学》一书,正是借此劝谏皇帝,以“正心诚意”为本,行“君子”之道以治国。

对其时已经处于灭亡前夜的南宋而言,吕中的这一论点似乎过于迂腐僵化,不合于时,但对追求“长治久安”的封建中国而言,《帝学》通过向人主“劝学”以“治心”,将家学、家法与国朝政事相联系,进而达到“治道”的目的,无论是对臣僚还是天子,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因此,明清两朝,对《帝学》的重视都有增无减。在现存明代官员罗伦于成化二年(1466年)的殿试对策中,罗伦在回答“帝王之国纲”的策问时,就以《帝学》为例,“以为自古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不学也”,由此得出“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务天下之大学”<sup>[8]卷一</sup>的道理。罗伦的这番议论,正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与范祖禹在《帝学》中所极力称颂的“帝王之学”如出一辙。

不仅臣子大力提倡《帝学》，后世皇帝们对其也很是重视。明代宗朱祁钰于景泰五年(1454年)颁《君鉴》五十卷于群臣，其中七卷专记明朝成化以前诸帝的言行，与《帝学》极为类似。其后，明朝重臣张居正等又编《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名之”<sup>[9]761</sup>，作为进呈万历皇帝的启蒙之书。该书选取尧舜以来可资效法的良法、善政八十一事，以及可作鉴戒的劣政败绩三十六事图绘解说，以供年幼的皇帝学习。这些著作，都可看作《帝学》影响的余韵了。

入清之后，清人大兴汉化，推崇儒学，而作为正统儒家思想的皇帝教科书，《帝学》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朝前期的两部重要书目——《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它都赞誉颇高。《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称它“自宓羲迄宋，凡帝王务学，求师之要灿然眉列，实为千秋金鉴”<sup>[10]31</sup>，《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对范祖禹称赞有加：“言简义明，敷陈剀切，实不愧史臣所言。虽哲宗惑于党论，不能尽用祖禹之说，终致更张初政，国是混淆。而祖禹忠爱之忱，惓惓以防微杜渐为念，观于是书，千载犹将见之矣。”<sup>[9]775</sup>《帝学》因为它所蕴含的“修身明德”之理，也深为皇帝所重。乾隆本人对它就颇为喜爱，不仅在书前加盖“稽古右文之章”和“乾隆宸翰”两印，还亲笔题写御诗，赞其“元祐成书心力殫，逮乎嘉定又重刊，欣兹祖禹芸编在，不异九龄金鉴看。务学求师着仪轨，修身莅政示倪端，知之行矣吾犹恶，缙几宁惟玩古观”<sup>[10]31</sup>。

#### 参考文献：

- [1]司马光. 涑水记闻[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2]李 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3]脱 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4]范祖禹. 唐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5]范祖禹. 范太史集[M]. 四库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6]范祖禹. 帝学[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8.
- [7]吕 中. 宋大事记讲义[M]. 四库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8]罗 伦. 一峰文集[M]. 四库本.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 [9]纪 昀.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0]钦定天禄琳琅阁书目[M].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业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On the Fan Zuyu's *Di Xue* and the Emperors' Education in Song Dynasty

Shen Huiqing<sup>1</sup>, Wang Ruilei<sup>2</sup>

(1.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Northern Song scholar-official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ling the country with the king”, have had a deeper level requirements of the emperor. Fan Zuyu, in his books *Di Xue*, discussed the emperors' education forms, connotations and meaning of emperors' education. The book is the most detailed rich works in education of Song Dynasty, which showed the Song peoples' concern on this issue and insight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Fan Zuyu; *Di Xue*; emperors' education; Jing Yan